

古代日本的都城空间与礼仪

GUDAI RIBEN DE DUCHENG KONGJIAN YU LIYI

王海燕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本书得到浙江大学侨福建设基金的出版资助

古代日本的都城空间与礼仪

王海燕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阐述 6 至 8 世纪日本都城制的形成和发展,以及都城空间与王权、礼仪、外交之间的关系。全书由 9 章构成,第一章至第四章,叙述日本古代都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及都城布局结构的演变,探究都城建设的理念;第五章至第九章,通过礼仪个案的分析,阐述 6 至 9 世纪即古代王权发展、鼎盛时期日本朝廷的礼仪与都城空间、对外意识等的关联。本书对中日两国古代礼仪空间的异同也进行了比较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日本的都城空间与礼仪 / 王海燕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8
ISBN 7-308-04948-5

I. 古... II. 王... III. ①都城—城市空间—研究—日本—古代②礼仪—简介—日本—古代
IV. TU984. 11②K893. 132.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2737 号

古代日本的都城空间与礼仪

王海燕 著

责任编辑 王大根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 hz. zj. 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杭州富阳育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3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8-04948-5/TU·060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88072522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倭国王宫的诞生	(4)
一、《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有关 5 世纪以前的王宫记载	(4)
二、环壕(濠)集落与高地性集落	(7)
三、中国史籍中的日本列岛诸国	(9)
四、5、6 世纪大王之宫与豪族居馆	(11)
第二章 飞鸟之都	(18)
一、推古王朝的强国意识与内政建设	(18)
二、飞鸟之都	(20)
第三章 日本律令制构想与宫都建设	(29)
一、大化改新与难波之都	(29)
二、中大兄称制及其迁都近江	(35)
三、军事防御性山城的建筑	(40)
四、大宰府的设置及其结构	(45)
五、天武·持统朝的造都事业	(48)
第四章 律令体制下的日本都城建设	(59)
一、律令体制的确立与京畿·国郡制	(59)
二、“帝皇之邑”平城京	(61)
三、新帝宅——平安京	(75)
第五章 外交礼仪与都城空间	(89)
一、7 世纪宫都的外交空间	(89)
二、8 世纪日本的外交礼仪与空间	(106)

三、中日外交礼仪空间的比较	(120)
第六章 射礼与空间——以7世纪为中心	(131)
一、古代中国射礼的演变	(131)
二、7世纪日本的射礼与空间	(140)
第七章 7世纪日本的五月五日礼仪	(149)
一、“五月五日”的语义	(149)
二、古代中国的五月五日习俗	(151)
三、7世纪日本的五月五日礼仪与王权	(154)
第八章 殡宫礼仪与王位继承	(167)
一、6世纪的殡礼仪与王位继承	(167)
二、7世纪的殡宫礼仪与空间	(170)
三、天皇殡宫礼仪的衰退与律令制国家的王位继承	(181)
第九章 禁苑与都城——7、8世纪为中心	(184)
一、禁苑空间的成立	(184)
二、年中行事与禁苑	(192)
三、结语：禁苑与都城布局——唐长安城与平城京的比较视点	(197)
后 记	(202)

导 言

古代都城的研究,一直是战后日本学术界的热门课题。这种研究热的出现,与战后考古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分的关联,尤其是飞鸟地区、藤原京、平城京、平安京等都城(宫)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极大地丰富了研究都城制及其相关问题的资料。在考古调查发掘中所获得的资料中,有些是文献史料中不曾记载或缺失的,有些则是对文献记载的补充或印证。这为学者们综合考古资料和文献史料,从新的视野和思维对都城及其相关领域展开分析、研究和讨论提供了条件。正是基于这一基础,都城研究取得了诸多的成果,同时亦更加推进考古学、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和建筑学等学科的发展。

日本学界对都城的研究,战后初期大多注重于都城的布局结构;之后,逐渐地由都城布局结构扩展到都城与王权、都城与外交、都城与礼仪等领域的研究。从日本学术界的多视角研究,可以受到重要的启迪,也就是深深地感到作为从事日本古代历史研究的工作者,有必要对都城予以足够的重视。因为,第一,都城的建筑不仅是建筑技术水平的标识,更主要的是它浓缩了当时的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精华;从建筑的规模和样式,可以看到古代日本的社会秩序和都城内居住者的社会地位和职业,也可以省悟到都城建设规划的思想理念。第二,都城是古代王权的正统性和权威性的象征。在都城的整体结构和王宫的不同布局中,寓含着王权的至高无上。例如,都城内的宫殿、宗教性设施、禁苑以及官衙等建筑形态,直接从视觉上显示了王权的神圣和神秘性。第三,都城内礼仪空间是政治与祭祀相结合的圣域。在古代政治体制下,礼仪的主体是王权礼仪,天皇(大王)是礼仪的最高主宰者。王权礼仪的场所有宫内和宫外之分;礼仪的内容也有祭神礼仪、即位礼仪、军事礼仪、外交礼仪、巡幸礼仪、年中行事、丧葬礼仪等等,根据各种礼仪的重要程度,其规模可以分为大、中、小三等。这些礼仪无不与王权紧密相关,而对古代日本王权来说,祭神礼仪、即位礼仪、外交礼仪是诸礼仪中最为重要的仪式。其中,祭神和即位两礼仪的核心就是表现天皇的神圣性,即所谓的“皇权神授”;外交礼

仪则是在显示国家实力和对外政策的同时,也向国人展示了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形象。

对日本都城的研究,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也陆续有著述问世,虽然数量并不多,但却反映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深度。据笔者所知,已出版、发表的主要著作和论文有:王仲殊的《关于日本古代都城制的源流》(《考古》1978年第6期)、王维坤的《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张十庆的《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方学风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对朝鲜、日本古代都城制的影响》(《延边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1期)等。已见的著述,主要从考古学和建筑学的视角对比中日古代都城的异同。而对于日本古代都城空间与王权、礼仪的关系,国内学者少有研究,尚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本书拟在国内外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对都城空间与王权、礼仪的关系作一初步的探索。

本书由九章构成,第一章至第四章,主要叙述日本古代都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及都城的基本结构;第五章至第九章则是本书的重点,通过礼仪个案的分析,阐述6—8世纪即古代王权发展、鼎盛时期的礼仪与都城空间的关联。在本书的行文论述中,对中日礼仪空间的异同也多有涉及。

第一章倭国王宫的诞生,依据日本古典《古事记》、《日本书纪》的记载和考古学资料,阐述日本列岛早期王权的出现和宫都的原始形态。

第二章飞鸟之都,记述7世纪前半叶倭国王权的强国意识,以及对表现王权中心所在地的王宫建设的重视。

第三章日本律令制构想与宫都建设,主要叙述7世纪后半叶的律令制国家形成过程中,宫都的建设和变迁。

第四章律令制下的日本都城建设,重点阐述在中央集权的律令体制下,都城建设的理念,以及平城京和平安京的都城布局结构。

第五章外交礼仪与都城空间,对7、8世纪日本的对外意识和外交礼仪的空间进行了分析研究,特别是通过对日本朝廷接待唐、新罗和渤海三国使节的场所、礼仪规格的异同考察,以及古代中日两国外交礼仪的比较,指出7世纪的倭国外交礼仪主要是吸收了周制外交礼仪的理念,其内容也与周制的宾礼和聘礼近似;而8世纪的日本外交礼仪无论是内容,还是礼仪空间,都相似于唐朝的外交礼仪。

第六章射礼与空间——以7世纪为中心,以中日比较的视角,通过考察作为7世纪日本(倭)王权重要礼仪的射礼与空间的关联,究明射礼的

政治寓意。特别指出 7 世纪日本(倭)的射礼在固有的元日射礼基础上,吸收了东汉射礼的理念以及周制的仪式,而射礼的场所都位于大王正殿的南面,也与东汉的射礼空间近似。

第七章 7 世纪日本的五月五日礼仪,在比较中日两国的五月五日礼仪的基础上,阐明日本的五月五日礼仪与中国阴阳五行思想的关系。五月五日礼仪的内容、场所与时代的变迁和政治情势密切相关,例如,推古朝时期表现为显示群臣冠位秩序与政治安定的“药猎”;天智朝时期则表现为寓意王权统治的正统性及君臣关系融洽的“纵猎”;而至天武朝时期发展为强调中央集权性统治的“射礼”,它是巩固王权的有力手段之一,因此被规定为国家礼仪。

第八章 殡宫礼仪与王位继承,阐述了 6—8 世纪日本天皇(大王)殡宫礼仪和空间的演变过程,揭示丧葬礼仪背后的古代王权的历史变迁,指出处于统治体制最高顶点的天皇(大王)的死,是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尤其在律令制国家成立以前,新大王的继位,多以前大王的死为契机,常常会诱发各种政治势力间的权力斗争,殡宫礼仪因此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色彩。

第九章 禁苑与都城——7、8 世纪为中心,根据考古资料和文献史料,追溯古代日本苑池空间的历史演变,并通过在苑池空间所举行的礼仪个案实例的考察,探索 7、8 世纪都城中的天皇(大王)苑池空间的性质。同时,还对唐长安城的禁苑与平城京的松林苑和南苑进行了比较。

以上各章既是本书总体结构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是自成独立体系的专论,因此,在某些史事分析和叙述中,会略有重复。

第一章 倭国王宫的诞生

一、《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有关 5 世纪以前的王宫记载

1. 神话中的宫殿

分别成书于 712 年和 720 年的《古事记》、《日本书纪》是现存的由日本人撰写的最古历史书籍。在这两部古典著作的神代卷中,记载着许多天神造国的神话传说。这些传说是古代日本原始信仰和宇宙观的反映。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所叙述的神话中,高天原、苇原中国,以及亡灵所在的根国(或黄泉国)是宇宙世界的三层结构,其中,高天原是太阳神——天照大神所在的天国;而苇原中国是由天神子孙治理的地上之国。

神话描述的高天原,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农耕社会,天国的“八百万众神”,时而农耕,时而从事手工业。诸神的农耕既有陆田的粟、稗、麦豆等种植,也有水田的稻作;手工业则包括制镜、制玉器、织布、蚕丝等技术性作业。作为天国的统治者,天照大神不仅拥有天安田、天平田、天邑并田等良田,而且还有自己的织布机房。天照大神同时也有自己的“宫室”,例如,其祭祀的场所设在“新宫”,其制神衣的地方也被称为“斋服殿”。

有天必有地,与天国相对应的是地国。神话中的苇原中国实际上就是地上之国,是日本列岛的代名词。苇原中国是神创造的世界,原是天照大神之弟素戔鸣尊的后代大国主神的统治之地,但是天照大神认为苇原中国应该由她的子孙来统治,于是采用强力手段,迫使大国主神“让国”,并派遣天孙琼琼杵尊来治理地上的世界。

根据《古事记》、《日本书纪》所传承的神话,苇原中国的宫室建造,始于苇原中国的最早开拓神——素戔鸣尊。素戔鸣尊本应该是治理海原的神,但是他却要求去根国,而且在赴根国之前,去了姐姐天照大神所在的高天原,且做出种种恶作剧的行为,被天上诸神逐出高天原。在前往根国的途中,素戔鸣尊首先降临到出云国,消灭了吞食少女的八岐大蛇,并与

出云国神的女儿稻田姬结为夫妻。为了新婚的寝所,素戔鸣尊在出云国寻找宫殿之地,最后在一个名为须贺的地方建造“须贺宫”,开始了与稻田姬的夫妻生活。当稻田姬生下素戔鸣尊的血脉后,素戔鸣尊把须贺宫交给稻田姬的父母管理,自己去了根国。^①此后,素戔鸣尊后代众多,其中大国主神完成了苇原中国的建立。

关于大国主神的宫殿,神话中并没有太多言及,只是大国主神同意“让国”后,天照大神为大国主神在出云国建造“天日隅宫”。此宫如同天神的宫殿那样宏伟,柱高大,板广厚。从此,大国主神不闻“政事”,只治“神事”,隐居于“天日隅宫”。^②

天照大神立天孙琼琼杵尊为苇原中国之主。琼琼杵尊带着天照大神所赐的八坂琼曲玉、八咫镜和草雉剑三件神器,从天降临到筑紫日向(今宫崎县)的高千穗峰。随后,琼琼杵尊在笠沙御崎建造高耸入云的宫殿。笠沙御崎是早晚都有日照的地方,被琼琼杵尊视为“吉祥之地”。^③

以上是出现在神话中的天照大神、素戔鸣尊、大国主神和琼琼杵尊四位神的宫殿。神话属于传承文学,不能作为史实的根据,但是却可以折射出古代人对事物的认识。《古事记》、《日本书纪》所记载的神话中,用“宫”或“殿”形容天照大神等诸神的居处,意在表明宫殿的神圣性质;而大国主神让国后的迁宫和天孙琼琼杵尊降临后的造宫的传承,则反映出宫殿是象征权力的建筑。

2. 倭王权初期的王宫记载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天皇记(纪),都是从神武开始的。但是,基于有关神武~仲哀 14 代天皇的记事欠缺历史性叙述,编纂者加笔的痕迹过重,可信度比较低,加之没有金石文及其他史料的证实,日本学术界普遍认为神武~仲哀 14 代极有可能是虚构的天皇。尽管如此,《古事记》、《日本书纪》中关于神武~仲哀 14 代天皇建宫的记载,对于探讨后世的宫殿建设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以神武建宫为例。神武是《古事记》、《日本书纪》中为了说明倭王权的起始而设计的人物。作为天孙琼琼杵尊的曾孙,神武率兵从日向出发一路东征,最终征服大和地区(今奈良县),费时达 10 余年。随着东征的

①《古事记》上卷·天照大神与须佐之男命。《日本书纪》神代卷上·第 6—8 段。

②《古事记》上卷·大国主神让国。《日本书纪》神代卷下·第 9 段 1 书第 2。

③《古事记》上卷·天孙降临。《日本书纪》神代卷下·第 9 段 1 书第 2。

推进,神武建造宫室的活动似乎也在不断地进行。神武首先从日向来到筑紫地区(今福岡县),进而抵达丰国(今福岡县、大分县一带)的宇沙,当地的豪族建造“一柱腾宫”献上;其后,神武在筑紫的“冈田宫”居住一年,又从筑紫到安艺国(今广岛县),停留在多祁理(タケリ宫,亦名埃宫)7年;再进入到吉备国(今广岛县、冈山县一带),“起行宫以居之”,宫名为“高岛宫”。神武在高岛宫滞留了数年,^①其间,神武“修舟楫,蓄兵食”,准备一举平定“天下”。经过多年的准备,神武之师经浪速国(难波,今大阪市)、河内国(今大阪府东部),进入倭国地区。征服倭国地区后,神武下令建造宫室:^②

诚宜恢廓皇都,规摹大壮。…且当披拂山林,经营宫室而恭临宝位,以镇元元。上则答乾灵授国之德,下则弘皇孙养正之心。然后,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紘而为宇,不亦可乎。观夫亩傍山东南樞原地者,盖国之壤区乎。可治之。

从上述描述中可以看出,神武的宫室建造与其政治势力的扩张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每征服一地,就会在征服之地建造一宫,然后以此宫作为征服下一个目标的大本营。《古事记》、《日本书纪》两书的编纂者借神武之口,说出朝廷建造宫室的目的是统治民众,反映了两书编纂的律令制时代,宫殿是显示天皇拥有统治国家权力的建筑。此外,“兼六合以开都”一句,也表明律令制国家的都城是展现天皇支配天下的象征。

根据《古事记》、《日本书纪》的记事,神武~仲哀 14 代天皇的宫室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显示政权中心的王都性质的宫(略称宫都);另外一类是行宫性质的宫,例如第 12 代景行,定都缠向(今奈良县樱井市)的日代宫,但是在美浓(今岐阜县)有泳宫;在丰前国(福岡县东部、大分县北部)有行宫;在日向国有高屋宫;在伊势有绮宫。

表 1 神武~仲哀 14 代天皇的宫都名

天皇	《古事记》	《日本书纪》	推定地
神武	亩火白栲原宫	亩傍樞原宫	奈良县樞原市
绥靖	葛城高冈宫	葛城高丘宫	奈良县御所市

①关于神武在高岛宫滞留的时间长短,《古事记》记为 8 年,而《日本书纪》则记为 3 年。

②《日本书纪》神武即位前纪己未年三月丁卯条。

续表

天皇	《古事记》	《日本书纪》	推定地
安宁	片盐浮穴宫	片盐浮孔宫	奈良县大和高田市
懿德	轻之境冈宫	轻曲峡宫	奈良县橿原市大轻町附近
孝昭	葛城掖上宫	掖上池心宫	奈良县御所市池之内附近
孝安	葛城室秋津岛宫	室秋津岛宫	奈良县御所市室
孝灵	黑田卢户宫	黑田卢户宫	奈良县矶城郡田原本町黑田
孝元	轻堺原宫	轻境原宫	奈良县橿原市大轻町
开化	春日伊邪河宫	春日率川宫	奈良县奈良市附近
崇神	师木水垣宫	矶城瑞篱宫	奈良县樱井市附近
垂仁	师木玉垣宫	缠向珠城宫	奈良县樱井市穴师附近
景行	缠向日代宫	缠向日代宫	奈良县樱井市穴师附近
成务	志贺高穴穗宫		滋贺县大津市附近
仲哀	穴门丰浦宫 筑紫诃志比宫	穴门丰浦宫	山口县下关市 福冈县福岡市香椎

二、环壕(濠)集落与高地性集落

上述的5世纪以前的宫室记载,由于夹杂着《古事记》、《日本书纪》编纂者的思想与意图,因此这些记载很难作为确实的资料来佐证宫室的存在。然而,考古学资料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提供认识日本古代都城的演变过程。

在绳文时代,人们的经济生活以采集、狩猎、捕鱼为主。但是,随着水田稻作技术的传入、传播以及金属器的使用,日本开始进入农耕社会,人们的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居住形态来看,进入弥生时代以后,在北部九州、近畿、关东等地区都先后出现了绳文时代未曾有的环壕集落,特别是弥生时代中期以后,各地更有大规模的、地域中心性质的环壕集落形成,其中,代表性的遗迹有佐贺县吉野里遗迹、大阪府池上曾根遗迹、奈良县唐古·键遗迹、爱知县朝日遗迹、神奈川县大塚遗址等。

由于水田稻作的缘故,弥生时代的环壕集落一般多建在离农耕地很近的低丘陵、台地(微高地)或者平地上,且临近河川。弥生时代中期以后的大规模的环壕集落几乎都具有多重壕沟的特点,唐古·键遗迹的环壕

多达四重。此外,有些环壕集落不仅设有壕沟,而且在壕沟外还建有土垒或木栅以及桩头削尖的桩子等设施。壕沟、土垒和木栅等防御性设施的出现,表明弥生时代的集落与集落间并不总是和平共处的,时而也可能会发生战争。

壕沟不仅可以用于防御,而且还有区分空间的作用。以吉野里遗迹为例,在被外壕环绕的集落内,南北各有一处内郭,分别被中壕和内壕两重环壕所围。南北内郭的内外部结构有所不同,其中,南内郭内发现竖穴住居群、楼状掘立柱建筑和掘立柱高床建筑;而北内郭的内部没有竖穴住居,只有掘立柱高床建筑。北内郭外设有高床仓库群,相反南内郭周边只有竖穴住居群,并没有设置高床仓库。南北郭内外配置的明显差异,意味着南北郭应该是性质迥异的空间。换句话说,壕沟具有划界不同性质区域的作用。

除了居住建筑和仓库建筑外,大型环壕集落内还设有神殿性质的建筑和金属器手工作坊。在池上曾根遗址,考古学者们发现数十栋竖穴住居遗迹和 1000 个以上掘立柱建筑物的柱穴遗迹,一座有 24 根支柱的巨大的掘立柱建筑物位于环壕集落的中心位置,其南面是一口直径 2 米以上的水井,建筑物和水井的附近是集中埋入石器和陶器的地方,建筑物的旁邻还发现金属器手工作坊遗迹。大型掘立柱建筑物与竖穴住居群形成显明对照,不仅意味着集落内的阶层分化,而且也表明存在掌管祭祀的首长层。而金属器手工作坊和大型掘立柱建筑的邻近,似乎说明握有祭祀权的首长层对金属器及其冶炼技术的管理。

弥生时代还存在另一种集落形态——高地性集落。这种形态的集落主要见于西日本地区,多建在海拔数十米至数百米的山地上,如冈山县贝谷山遗址(海拔 280 米)、香川县的紫云出山遗址(海拔 352 米)、兵库县的会下山遗址(海拔 200 米)。高地性集落在弥生前期末就已经出现,如京都府峰山町的扇古遗迹,但是经学者分析,这个遗迹的军事性质并不浓厚,相反倒是具有很强的定住性质。^① 然而,在弥生中、后期高地性集落的出土物中,石制武器和铁器,如铁镞、石镞、石剑、石矢尻等占有不小比重。根据中国史料记载,在相当于弥生中、后期的年间,日本列岛先后出现战乱局面,如《魏志》倭人传记载了卑弥呼继承王位前的“倭国乱”、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之间的“相攻伐”、卑弥呼死后的国中因不服立男王的“相

①小笠原好彦:《环壕集落和高地性集落》,佐藤宗淳编:《日本の古代国家と城》,新人物往来社 1994 年,第 39~42 页。

诛杀”等争乱;《后汉书》东夷传也记述了东汉恒灵年间(147—188年)的“倭国大乱”。由于弥生中、后期以后,高地性集落多分布于濑户内沿岸至近畿一带,因此高地性集落的盛行很可能与史籍中记载的争乱有关,具有很强的军事性质。

在许多高地性集落遗址中都发现了住居遗迹,例如,建在六甲南山麓的会下山遗址,不仅发现一般住居建筑物的遗迹,而且还有祭祀遗迹,以及祭祀遗迹下方的用栅栏区划的大型住居。此外,高地性集落的出土物中也不只有武器,还包括锄先、石庖丁(石刀)等农具。^①所以,多数学者都认为高地性集落以军事性质为主的同时,也具有日常生活的性质。^②

环壕集落和高地性集落的防御性能,映射出弥生时代中、后期的集落与集落间的争乱,而这些争乱恰是诸集落趋向统一的先兆。

三、中国史籍中的日本列岛诸国

《汉书》地理志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但是,根据《魏志》倭人传的记载,到了《三国志》成书时代,经过争乱之后的日本列岛,百余国已经兼并成为对马国、一大国、末庐国、伊都国、奴国、投马国、邪马台国、狗奴国等为代表的三十余国。其中,奴国、伊都国、邪马台国不仅国力较强,而且还与中国大陆有着政治文化往来的关系。

关于奴国与中国王朝的往来,《后汉书》东夷转载:

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

①例如京都府田边町天神山遗迹发现锄先;大阪府和泉市观音寺山遗迹、紫云出山遗迹、塚贝谷山遗迹发现石庖丁(石刀)。

②关于高地性集落的性质,学者们也是各有见解。如:有些学者认为高地性集落是防塞性集落(石野博信:《高地性集落と环壕集落——弥生の高城と水城》,《战后50年古代史发掘总まくり》朝日グラフ別册,朝日新闻社1996年);有些学者认为高地性集落具有争乱时暂时居住地的性质(小笠原好彦:《环壕集落と高地性集落》);有些学者认为居住在高地性集落中的人们,战时为士兵、非战时为农民(春成秀尔:《倭国之乱——环壕集落と高地性集落》,石井进、千田嘉博编:《城の語る日本史》,朝日新闻社1996年);还有的学者认为高地性集落属于军屯性质,类似于中国汉魏时代的军事屯田,军队自己垦田种粮以解决军粮问题(王金林:《秦汉时代的中国与日本》,《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1784年,福冈县志贺岛发现了刻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被确定是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奴国使节从中国带回日本列岛的印玺。根据中国的印绶制度,天子玉印,诸王和宰相金印紫绶,九卿银印青绶,其他官人铜印黑绶或木印黄绶。金印紫绶的赐授表明东汉王朝视奴国国王如同诸王、宰相,反映了对奴国的重视。奴国的所在被推定位于福冈市、春日市及其周边的福冈平原,其中心是春日市的须玖冈本遗址群。须玖冈本遗址群中不仅出土大量的青铜制品的铸型和手工作坊遗迹,而且还在一块长3.3米、宽1.8米的扁平大石下发现一座弥生时代后期的瓮棺墓,其内外的随葬物有近30面的西汉铜镜、青铜制武器和玻璃璧等。

伊都国是与奴国相邻的国,位于福冈县怡土平原的前原市三云·井原遗址群被推测是伊都国的中心所在。在弥生中后期的三云南小路遗迹发现了1号瓮棺墓和2号瓮棺墓,其中1号瓮棺墓的随葬物有35面大型西汉铜镜、青铜制武器以及大量的玻璃玉等;而2号瓮棺墓的随葬物则包括22面小型西汉铜镜等。

须玖冈本遗址和三云南小路遗址出土的豪华随葬品,表明墓主人的社会地位非同寻常,很可能分别是奴国和伊都国的首长。此外,大量西汉铜镜的发现也旁证了中国史籍中所记载的奴国等国与汉王朝的往来关系。

相当于弥生时代后期的2世纪,地域性的政治联盟开始陆续出现于日本列岛各地。随着铁器的普及,对各地首长层来说,握有自朝鲜半岛南部的铁资源输入渠道是确立其统治权的重要前提条件。在铁资源以及其他大陆先进文物输入渠道控制权的争夺中,为了结成同盟,地域性政治联盟相互结合形成广域的政治联盟。中国文献史料中所见的邪马台国就是这样的广域政治联盟的中心。根据《魏志》倭人传记载,邪马台国是统合20余国的女王国之都,“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作为统合各地政治势力的女王卑弥呼,不仅以“事鬼道,能感众”的灵力稳定其统治,而且通过“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等措施,既保持其宗教性权能的神秘性,又体现广域政治联盟首长的政治威势。

关于邪马台国的所在地,学界有九州说的吉野里遗迹与大和说的奈良县樱井市缠向遗迹之争,但是近年来,大和说逐渐成为主流。然而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不否认3世纪中叶后的邪马台国联盟所结集的政治势力,可能涉及畿内大和至北部九州的广大地区。

根据《魏志》倭人传,正始八年(247)前后,素来与卑弥呼不和的狗奴国和邪马台国之间发生冲突。虽争乱的规模及内容不详,但是此后的文献史料中再无有关狗奴国的记载,可以想象邪马台国联盟在这场争乱中合并了狗奴国,其版图随之扩大。此后不久,卑弥乎死,“大作冢,径百余步”。巨大的卑弥呼墓的建造,不仅说明广域政治联盟首长的死具有政治性意义,同时也预示着日本列岛的古坟时代将要来临。

四、5、6 世纪大王之宫与豪族居馆

1. 5、6 世纪的倭王之宫

中国文献史料中,《魏志》倭人传和《宋书》倭国传分别记述了 3 世纪和 5 世纪的倭国,但对 4 世纪的倭国却没有任何记载。然而,金石文和考古资料使我们这一时期倭国的政治动向有所了解。根据高句丽广开土王碑的碑文,4 世纪末至 5 世纪初的倭国和百济结成同盟,与高句丽发生军事冲突,经过 17 年的对抗,最后以 407 年的倭国败北画上了句号。对朝鲜半岛的军事外交的失败,促使 5 世纪的倭王权再度展开对中国王朝的外交。

420 年,南朝的宋建国。以 421 年的倭王赞遣使入贡为始,倭王赞、珍、济、兴、武,即所谓的倭五王,先后多次派遣使节朝贡宋王朝,同时接受宋皇帝所封的官爵。^①倭五王展开对宋的外交,实际上是与朝鲜半岛诸国的关系密切相连。例如,倭王珍于 438 年要求宋皇帝封其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显然,倭王对宋的外交目的不仅旨在对倭国的国内统治,而且还意图握有对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等朝鲜诸国·诸地区的军事控制权。

倭五王的赞、珍、济、兴、武分别被推定为《日本书纪》中所记述的仁德、反正、允恭、安康、雄略五位“天皇”。关于倭五王的宫的具体形态,考

^①413 年,倭王赞曾派使节朝贡东晋(《晋书》安帝纪义熙九年条;《梁书》倭传;《南史》倭国传)。但是根据中国史料的记载,这年的倭国使节是与高句丽使一起入朝东晋的。对此,日本学界普遍认为,对与高句丽仍处于敌对关系的倭王权来说,当时不可能采取从属高句丽的外交形式,入朝东晋的倭国使节只是高句丽以抓去的倭人俘虏来充当的。

古学上尚未解明。但是,根据金石文资料,却可以略知一二。1978 年从埼玉县稻荷山古坟中出土的稻荷山铁剑的正面和反面共刻有 114 个汉字。根据埼玉县教育委员会刊行的《稻荷山古坟出土铁剑金象嵌铭概报》记载,铭文全文是:

(正面)辛亥年七月中记,乎獲居臣上祖名意富比埴,其儿多加利足尼、其儿名彊己加利獲居、其儿名多加披次獲居、其儿名多沙鬼獲居、其儿名半彊比

(反面)其儿名加差披余、其儿名乎獲居臣。世为杖刀人首,奉事来至今。獲加多支鹵大王寺在斯鬼宫。时,吾左治天下,今作此百练利刀记吾奉事根原也。

铭文详细地记述了“奉事”大王的“乎獲居臣”的系谱,自其上祖开始,世世为朝廷的“杖刀人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獲加多支鹵大王寺在斯鬼宫”一句。据此可知,“斯鬼宫”内设有“寺”,即“廷”或“官所”性质的建筑,^①是杖刀人首“奉事”大王的场所。“獲加多支鹵”的音读为“ワカタケル”,近于雄略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被标记的大长谷若建命和大泊瀨幼武的“オホハツセノワカタケル”音读,因此,学界一般认为,獲加多支鹵大王与倭五王中的武,即雄略大王实为同一人。至于“斯鬼宫”的所在,“斯鬼”的音读为“シキ”,应该是指矶城地区,即今奈良县矶城郡樱井市一带。日本文献史料所记载的雄略王宫中,并无“シキ宫”。《古事记》雄略记载:

(雄略)坐长谷朝仓宫,治天下也。

《日本书纪》雄略即位前纪安康三年十一月甲子条载:

(雄略)命有司,设坛于泊瀨朝仓,即天皇位,遂定宫焉。

此外,《日本灵异记》第 1 话·捉电缘中有“雄略天皇住磐余宫之时”语句。据此可知,雄略的王宫有朝仓宫和磐余宫。朝仓宫和磐余宫的所在分别被推测为奈良县樱井市肋本遗迹和矶城郡一带,恰处于矶城地区。而《古事记》所载的雄略在朝仓宫“治天下”也与稻荷山铁剑铭文所表达的杖刀

^①关于“寺”字的解释,《说文解字》:“寺,廷也。有法度者也”;《释名》释宫室:“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续於其内也”;颜师古对《汉书》元帝纪中“城郭官寺”的注释:“凡府庭所在,皆谓之寺”。颜师古对《汉书》何并传中“令骑奴还至寺门,拔刀剥其建鼓”的注释:“诸官曹之所,通呼为寺。”